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方协同发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湖南高校应勇担使命,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要求,持续优化办学模式,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产教融合,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注入持续动力,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强大智力支撑与人才支持。

坚持智能化方向,打造数字化转型新高地

《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并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作为重要战略举措。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推动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变革、塑造人类生活新形态的核心驱动力。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达到127亿元,同比增长17%,聚集重点企业超300家。根据《湖南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到2026年,全省智能算力将达到3600PFlops,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高校应积极加入我省“智赋万企”等行动,切实赋能实体经济转型。

构建以产业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才基础支撑。我省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加快发展智能算力”战略部署和湖南具体规划,主动对接国家超算长沙中心、

湘江实验室等重大平台,共建共享智能算力资源,参与全省算力调度机制建设。在人才供给端,紧密对接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增设智能科学与技术、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专业,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课程体系与教学实践,着力增强学生在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等领域的实操能力与系统思维,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兼具扎实工程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打造协同攻关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平台,突破转型关键瓶颈。高校应依托自身科研优势,主动对接制造业集聚区,参与行业大模型建设,尤其应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湖南重点产业领域,在核心工艺优化、系统集成创新等关键应用技术上,助力企业实现生产流程再造与能效提升,为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拓展全域服务的“人工智能+”融合示范路径,激发转型内生动力。面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高校应组建专业技术服务团队,积极开展智能制造水平诊断和数字化改造方案设计。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文化创作、养老托育等民生福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探索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和城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助力打造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为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贡献高校智慧。

聚焦绿色化转型,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建议》提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求“推动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高端人才聚集地,我省高校应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服务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钢铁、有色、石化、新能源等重点行业,精准赋能实体经济绿色化转型。

开展前沿绿色技术的协同攻关与供给。高

校应主动对接湖南重点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需求,围绕工业节能、信息化节能、工业节水、先进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减污降碳六大领域,组织跨学科团队进行有组织的科研;针对钢铁流程再造、有色金属节能冶炼等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围绕高效节能装备、VOCs协同治理、赤泥综合利用等方向,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工艺、新装备和新产品。

促进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高校应积极运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覆盖能源管理与环境监测的数字孪生系统,聚焦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高耗能单元,实施用能的实时智能监控、动态优化与精准调控,深挖节能潜力。积极响应《建议》关于“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将数字技术融入能源消费、供给、存储全链条,助力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并通过对企业生产流程的全面数据感知与智能分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实施工艺节能、管理节能和系统节能,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数字动力。

大力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推进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等工业固废减量与综合利用,强化废旧机电、废塑料、废旧动力电池等再生资源回收与再制造技术研究,支持零碳流程再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技术转化,全面服务区域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推进融合化发展,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建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此,高校应深度融合入区域创新体系,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

键堵点。

建立“双进双转”式协同机制,精准破除校企壁垒。应推动企业带问题进高校、专家带成果进企业,促进成果转化与企业转型制度化。高校可定期组织跨学科团队走访重点园区,摸排真实技术需求,建立动态“需求清单”与“成果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力争在联合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大突破。

共建“揭榜挂帅”式创新平台,攻坚产业“卡脖子”难题。企业应发挥“出题人”“阅卷者”作用,高校则应主动发挥基础研究优势,自觉当好“做题人”“答卷者”,主动担当湖南制造业“揭榜挂帅”项目,组织跨学科团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服务企业核心竞争力。应联合产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突破一批产业发展难题。比如山河智能联合湖南高校及上下游配套企业攻克高频高压液压元器件制作难题,涟钢与高校共建联合创新中心研发“手撕钢”等成功经验,都是高校助力湖南传统产业向高端转型、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的鲜活注脚。

完善“中试贯通”式转化链条,打通产业化“最后一公里”。湖南高校可借鉴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打造的技术经理人穿针引线模式,大力培育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化技术转移队伍;积极参与云溪工业园区化工中试基地等省级中试平台建设,为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成果提供实验数据支持,加速类似“己内酰胺绿色生产技术”等重大成果落地转化,并积极推动将创新成果纳入省级重点产业技术攻关计划与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应用指导目录,加速其在产业链中的规模化应用与迭代升级。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武陵山区和美乡村建设的共商模式研究”(24YBA119)阶段性成果】

积极推进“微治理” 构筑多元共治新格局

匡立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微治理”是以小范围的社区空间为治理单元,依托灵活多样的小微载体和平台,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其价值不仅在于可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还在于能以灵活方式延伸至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从源头抓早抓小,有效构建基层治理安全网,从而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积极探索“微治理”运行机制,构筑社会多元共治格局。

划分“微网格”,优化治理单元。社区通常范围广、住户多,在传统治理模式中,易存在服务盲区和治理死角。科学划分“微网格”,有助于实现管理精细化、责任落实精准化。一是科学划分,实现空间全覆盖。依据地域分布、人口结构、管理难度等因素,将社区(村)细分为若干基础网格,并根据楼栋、院落、自然村等进一步划设“微网格”,形成“社区—网格—微网格”

三级治理架构,将治理的“大板块”切分为精细的“小单元”。二是配强力量,实现人员到位。整合社区干部、专职网格员、居民组长、党员、物业人员、志愿者、居民等多方力量入网入格,分别担任政策宣传员、信息采集员、矛盾调解员、安全守护员、便民服务员,明确“微网格”责任人,力求“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三是数字赋能,实现信息全联通。依托社区信息平台或移动终端,建立“微网格”线上工作群,实现信息即时传递、事件快速上报、任务高效处置,以科技手段提升“微网格”的响应速度和管理效能。

建好“微组织”,凝聚治理合力。基层社会需求复杂多样,单一行政力量难以精准满足,必须充分激活,有序引入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的“活水”,使其成为“微治理”的坚实基础。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筑牢“主心骨”。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等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引领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确保“微治理”的正确方向。二是培育居民组织,激活“内生力”。积极扶持社区内的业主委员会、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志愿者服务队、文体兴趣小组等居民“微组织”,鼓励它们基于共同需求,在矛盾调解、

环境维护、为老服务、文化活动中发挥作用,加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三是推动协同联动,形成“共同体”。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微组织”联席会议、民主协商议事会等机制,引导各类组织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同向发力,变“独角戏”为“大合唱”,使多元化活力在规范框架内竞相迸发。

聚焦“微服务”,夯实善治根基。“微治理”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应以贴心周到的“微服务”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微实事”。一是畅通渠道,精准识别需求。依托“微网格”走访、线上议事厅、居民提案等多样化路径,构建常态化、便捷化的民情汇集机制,及时察知看似细微却直接关系群众生活质量的诉求,如垃圾处理、车辆停放、宠物喂养等,从源头识别并解决问题。二是整合资源,提升响应效能。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依托,统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服务与社会志愿力量,构建“15分钟服务圈”。对可即时处理的事项,由网格员或社区“微组织”迅速处置;对复杂问题,则启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协同机制,防止问题发酵升级。三是创新方式,拓展服务内涵。积极推行“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探索“时间银行”“邻里互助”等模式,

重点关注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个性化、有温度的关爱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营造和谐、便利、温馨的生活环境,夯实基层善治根基。

善用“微激励”,提升治理效能。建立有效的“微激励”机制,有助于激发各方参与热情、提升治理效能。一是建立积分管理,量化付出贡献。探索推行“道德积分”“志愿服务积分”等制度,将居民参与巡逻值守、环境整治、调解纠纷、文明倡导等治理行为量化积分,继而用积分兑换生活物品或社区服务,促进“奉献—积累—回报”的良性循环。二是强化荣誉表彰,彰显价值导向。定期开展“最美网格员”“优秀楼栋长”“社区热心人”等评选活动,通过社区光荣榜、表彰大会、媒体宣传等形式,给予获奖者精神荣誉和公开表扬,满足其被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需求。三是为骨干赋能,拓展其发展空间。将“微治理”骨干纳入社区人才库,优先推荐其为“两代表一委员”人选或社区后备干部,提供系统培训,将其治理实践作为个人信用的正向参考,强化正向循环,更好激活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文理学院基地特约研究员】

提升社会组织嵌入效能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根基

陈建平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提升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对于夯实治理根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三重现实困境。一是政治嵌入性困境。部分社会组织面临合法性认同不足、制度性支持渠道不畅等问题。二是关系嵌入性困境。与政府关系方面,沟通机制不健全,“项目式合作”多,“战略性协同”少;与社区关系方面,未能有效融入社区网络,与社区居民、居委会、业委会等主体存在“社交隔阂”;专业程度方面,其专业服务与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存在“错位”,专业性未被充分认知和接纳。三是文化嵌入性困境。一些社会组织的专业理念、工作方法与话语体系,与基层社区长期形成的

地方性认知、“熟人社会”逻辑等存在“文化排斥”反应。由此可见,提升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须强化政治引领、关系融合与文化适应。

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社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的“根”与“魂”。政治引领是根本保障,应通过强化党建与制度供给,确保社会组织发展方向正确、根基牢固。以党建引领明确方向。通过建立健全功能型党支部、党建指导员等机制,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方面,推动党组织“应建尽建”,加强社会组织党组织班子、党员管理,坚持将党的意志有效转化为社会组织决策;另一方面,委派党建指导员深入社会组织业务环节,引导党员在服务中亮身份、作表率,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社会组织始终围绕国家战略、聚焦群众需求开展工作。以制度保障拓展空间。完善的制度保障,是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 and 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石。一方面,依托党建平台整合各类资源,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培育扶持体系,重点培育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头部”社会组织,并帮扶新兴社会组织,为其提供软硬件支持;参与社会治理机会和实践

指引;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应将党组织的价值理念纳入组织章程,并参照党内管理制度优化内部治理、提升运行效率和公信力。

促进关系融合,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的“桥”与“网”。关系融合是提升社会组织嵌入效能的重要支撑,应通过搭建协同平台、激发内生力量,织密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合作网络。搭建协同治理平台。建立健全基层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协商治理议题,明确各方权责;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政策、资源、需求等数据互联互通,提升社会组织响应效率;在项目规划、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估中引入多元主体参与,拓展社会组织行动空间,促进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治理良性互动,激发社区共治的内生性力量。社会组织成员应主动“下沉”社区,以志愿者、“邻里相助”等角色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积极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鼓励社会组织扎根社区,支持其发展为枢纽型平台,发挥他们贴近群众、反应灵活的优势,联动居民组织、业委会、志愿团队等力量,推动议事协商常态化,提升社区资源整合、自我管理能

力。推进文化适应,彰显社会组织嵌入基层治

理的情”与“理”。文化适应是深层纽带,也是提升社会组织嵌入效能的内在要求,应通过倡导践行“在地化”工作方法、塑造共同体文化,促进各类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倡导践行“在地化”工作方法。引导社会组织尊重并主动学习基层特有的“地方性知识”与“熟人社会”运行逻辑,深入了解当地风俗习惯,通过将专业理念、工作方法与本土智慧相结合,转化为当地群众能听懂、易接受、愿参与的行动方案,使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在基层土壤中扎根、生效。塑造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定期组织贴近居民需求的社区文化活动、系统化培育社区志愿者骨干、深入挖掘并生动讲述社区故事等方式,激发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和主体意识,增进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同,使社会组织的专业价值追求与社区长期形成的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等价值理念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社会组织从外部“嵌入”到社区肌理深度联结、被居民内心认同的“融入”。

【作者系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教师。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嵌入性困境及对策研究”(23SH12)阶段性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强乡土文化能人扶持,引导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十四五”时期,湖南进一步建立健全乡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使农村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当前,应立足新起点,切实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量”“质”齐升,由“有”到“优”,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加强平台建设,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应遵循“县级统筹调度、乡镇有效衔接、村级落地服务”原则,充分发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线上线下平台联动作用,为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夯实基础。其中,县级职能部门应强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调度与配送枢纽功能,综合县域实情,整合社交媒体平台、政府文化服务网站、文化需求调研App等线上平台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线下平台,形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矩阵,支持乡村构建“十五分钟文化服务圈”;乡镇职能部门应主动承接县级资源并组织域内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从设施建设、项目开发等方面帮助各行政村开展相关服务;各行政村应注重平衡传统与现代智慧,管好用活多元化、具有审美价值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出制度化、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与此同时,加强线上线下平台联动,形成涵盖“需求感知—智能调度—服务送达—评估反馈”全链条的深度融合闭环:建立以数据驱动的村民公共文化需求“画像”体系,通过在线上线下平台收集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时间、内容、形式等需求信息,动态识别村民文化偏好、参与能力与需求类型;基于平台汇聚的需求热力图和“点单”数据,智能生成线下资源配送最优路线;开展线下活动时,鼓励乡村居民通过线上平台分享体验和感受,实现线上线下平台的互动与相互引流;依据平台数据流、信息流,形成评价及改进建议,用以不断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加大科技赋能,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迭代升级。坚持科技向善,以数智技术深度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支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一是激活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运用超高清扫描、三维建模、多轨语音采集等技术,对乡村文物、非遗项目进行系统性数字化采集,建立“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助力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活化利用。二是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场景。运用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组织开展“云展览”“数字非遗工坊”等线上活动,扩大优质服务覆盖面。三是培育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注重调动村民参与文化创作及传播的热情,引导他们结合现代科技与本土视角记录乡土记忆、展示非遗技艺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乡村文化发展良性循环。支持乡村发展数字文创、智慧文旅等新兴业态,鼓励开发具有乡土特色的数字藏品、短视频等公共文化产品,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转化。四是推进包容性服务。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需求,保留线下文化站代操作、文化活动纸质预告等传统服务,面向老年人开展数字技能普及培训,消弭数字鸿沟,确保科技赋能过程中尽可能“不落一人”。要用新技术唤醒乡村文化生命力,用新模式重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链、用包容守护乡村文化权益公平性。

健全机制保障,厚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内生动力。聚焦规范服务流程,实现服务可持续,建立健全长效化机制,保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一是优化运行机制。政府部门持有公共文化设施的产权与监管权,可通过公开招标、委托运营等方式,依法依规将其交由合格的社会组织、文化企业、村民合作社等主体运营;政府部门应严格把关运营主体的专业资质和专业能力,以设施使用率、村民满意度等指标,对运营主体进行考核,实行能进能出、优胜劣汰;坚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属性,做好常规性图书文献借阅、普惠性文艺辅导培训、公益性展览展示、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等乡村公共文化基本服务。二是完善投入保障机制。一方面,建议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保障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维护、基本服务供给、本土人才培养等刚性需求,并向偏远村、基础薄弱村倾斜;另一方面,应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资金、资源捐赠等形式反哺家乡文化建设,引导农业企业、文旅企业通过赞助村级文化活动、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产业等方式参与投入,同时适度发展文艺进阶培训等非普惠性服务,所得收益用于补充专项运营资金。三是筑牢人才培养与留用机制。实施系统性“乡村文化能人培育计划”,建立本土文化能人数据库,开展分层分类培育培训,同时引入文化特派员、实施驻地专家家计划,强化文化志愿者服务,推动人才外部引入与本土培养优势互补;通过组织开展有影响力的“村字号”文体活动,为乡村文化人才搭建实践平台、打造职业通道、推出个性化IP,留住并用好人才。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